



从薅草锣鼓中追寻传统农业时代的节奏 ——以川楚陕交边地区为中心

张建民

摘要: 作为重要非遗的薅草锣鼓等传统农作音乐,除了其音乐、艺术、语言等专业层面的价值及活跃劳动气氛、提高劳动效率、祈盼风调雨顺等功效,在其简单粗犷的形式中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蕴含着深厚、具有重要价值的时代精神,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个体小农经济条件下,“更互力田”、通力合作的传统,通过助工、换工等途径实现互助方式的长期延续。不仅在山区,亦不止于粗放的刀耕火种农作方式。始初的薅草锣鼓不是孤立存在的艺术形式,必须与互助的集体劳作相结合方有用武之地,此乃薅草锣鼓突出的特征之一,对于认识传统农耕技术、农业经济发展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薅草锣鼓; 更互力田; 农作制度; 农耕文化

顾名思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精神和观念方面的价值,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客观认识历史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保护、传承亦初见成效。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众多,且要活态传承,要达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出的最终目标,并非易事,一系列有关保护、传承的相关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本文以薅草锣鼓等传统农作音乐为中心,谈一点粗浅认识,失当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一、丰富多彩的传统农作音乐

与中国农业史相应,传统农作音乐在中国有悠久历史,不仅歌唱内容丰富,歌唱形式亦多种多样。除农作各个环节的劳动号子外,还有各种田间劳动时吟唱的田歌、山歌以及称作“锣鼓”的表现形式,近年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已有数十种之多,其中“薅草锣鼓”类的农作音乐便颇具代表性。

论者或顾名思义,将薅草锣鼓视作农田除草时所演唱的一种农作音乐,但实际上它并非仅出现在除草环节,大量历史记载表明,在耕种、薅秧、插秧、薅草等诸多农业劳动场合,无不有薅草锣鼓的声音。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扩展名录)之民间音乐类的项目,川北薅草锣鼓之外,还有湖北宜昌薅草锣鼓、五峰土家族薅草锣鼓、兴山薅草锣鼓、宣恩薅草锣鼓,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薅草锣鼓亦是有代表性的名称之一,属同一性质的传统农作音乐在各地有各自的叫法,如“挖山鼓”、“花锣鼓”、“插田歌”、“车水锣鼓”、“薅秧歌”、“喊秧歌”、“耘鼓”、“耘田鼓”、“打锣鼓草”、“薅锣鼓草”、“撵锣鼓草”、“薅草歌”、“打鼓歌”等。长江中上游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各省市以及陕南等地,均有

薅草锣鼓流行。广东等地亦有类似田歌^①。不仅汉族地区,土家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亦有传唱。

此外,一些以民歌为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包括了大量的传统农作音乐,如湖北兴山民歌的主体内容即兴山薅草锣鼓,陕南紫阳民歌包括农民干“帮帮活”时唱的“锣鼓草”,重庆市巴南木洞山歌较为流行的有薅秧季节唱的“打薅歌”和秋收季节唱的“打谷赛歌”,四川南溪号子的雏形就是土家族农民在劳动中解乏鼓劲的劳动号子和山歌号子,而湖北“长阳山歌”的具体内容就是长阳薅草锣鼓。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音乐类中,湖北监利啰啰咚之外,则有安徽省六安市大别山民歌、河南省西峡县西坪民歌、湖北潜江民歌、湘西瑶乡茶山号子、陕南汉中市巴民歌、重庆秀山民歌、酉阳民歌、湖北天门民歌、江苏金湖县薅草锣鼓(金湖秧歌)等。

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农作音乐更多,如四川开江的薅秧歌、川东薅草锣鼓、川北茅山歌,湖北神农架林区的薅草锣鼓、南漳县薅草锣鼓、通山县薅草锣鼓、京山田歌,湖南湘西土家族的挖土锣鼓(实即薅草锣鼓)、石门罗坪山歌等。与种植业劳作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民歌更是不计其数。

各地的传统农作音乐各具特色,即使基本性质乃至名称相同,具体的表现形式、程序等,仍然互有差异,难以完全划一。以湖北宜昌地区为例:薅草锣鼓就有长阳薅草锣鼓九板、长阳薅草锣鼓十三腔、长阳界岭薅草锣鼓、长阳界岭薅草锣鼓十二声、远安花锣鼓、宜昌县吹锣鼓、宜都聂河薅草锣鼓、当阳双莲扯草吹锣鼓、当阳薅草锣鼓、当阳庙前扯草锣鼓、兴山薅草锣鼓、秭归薅草锣鼓、五峰薅草锣鼓、宜昌县扯草锣鼓、当阳扯草歌、当阳王店扯草锣鼓、枝江扯草调等近20种。再如木洞山歌的主体是薅秧歌“禾籓”,仅在木洞及其周边地区,禾籓就有多种曲调,主要者如高腔禾籓、矮腔禾籓、平腔禾籓、花禾籓和连八句等样式,一种样式中又包括了若干子样式,如高腔禾籓就包括依呀禾籓、也禾籓、锣鼓腔、依依腔、呀呀腔、四平腔、噢嗨腔、呜哦腔、悠呵腔等。

薅草锣鼓的乐器组合及使用亦无统一规定,一般说有鼓、锣、钹、钲、马锣等数种,具体使用数量却不尽一样,大多数用鼓和锣二种,也有用到三种甚或四种者。鼓手领队发歌、指挥,其它乐器配合,薅草众人接腔和唱。少者如屏山县的薅草歌,其伴奏乐器只有鼓,连锣都没有,由鼓师一人击鼓领唱,薅草劳动者接腔和唱。正如鄂西北民间谚语所云:锣鼓不出乡,各是各的腔。

传统农作音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具体到薅草锣鼓言之,有从民间艺术学、音乐学、表演学等专业层面展开的艺术形式、艺术特点、美学思想、发展规律的探讨,亦有从歌词的语言特征、音乐和语言的结合等方面进行的语言学研究,还有以探讨民间宗教信仰为目的的研究。从其功能、意义上考察,不少论著强调或论及祈神驱灾、活跃劳动气氛、激发劳动兴趣、督促劳动进度、传授劳动经验、抒发劳动中的苦乐心情、祈盼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消除疲劳、提高劳动效率等方面,体现着寓“乐”于“劳”、寓“教”于“歌”、“劳”“乐”结合的特色,反映了劳动者藐视困难、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等。总体上讲,从音乐形式、歌词切入的研究较多,从农耕文化、历史传统出发的探讨较少^②。其实,传统农作音乐的意义远不止于音乐,结合相关典籍记载加以深入系统考察,不难发现其简单甚或粗犷的形式中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蕴含着深厚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传统精神。

二、薅草锣鼓与传统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

薅草锣鼓类农作音乐起源的具体时间已难确考,据《唐诗纪事》所记蜀僧可朋《耘田鼓诗》相关内容,可证唐代以前已有关于此类农作音乐在四川等地流行的明确记载。史称可朋见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二《诗语·粤歌》载:“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② 参见方天:《江汉平原上的薅草歌》,载《人民音乐》1959年第6期,第24~25页;胡曼:《鄂西北薅草歌的结构形式》,载《中国音乐》1983年第1期,第66~67页;黄少文:《漫谈三峡库区的薅草锣鼓歌谣》,载《重庆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55~58页;张堃、谭宗派:《对湖北省利川市濒临消失的“薅草锣鼓”的田野采风及思考》,载《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第159~163页;莫代山:《土家族薅草锣鼓艺术的文化内涵》,载《四川戏剧》2009年第4期,第33~34页;刘小琴:《四川宣汉县薅草锣鼓初探》,载《中国音乐》2010年第3期,第79~83页;张昕:《重庆土家族薅草歌的文化特质与艺术特征》,载《人民音乐》2011年第1期,第55~57页;胡晓萍:《薅草锣鼓的伦理价值和德育功能初探》,载《四川戏剧》2011年第3期,第104~105页;周兰:《论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的歌词特征》,载《北方音乐》2012年第8期,第139~140页;张琪:《四川屏山薅草歌中的宗教信仰》,载《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5期,第53~56页。所涉文章颇多,恕不赘列。

击鼓,罢敝不休”^①,有感而作《耘田鼓诗》。“耘田击鼓”一语,正是薅草锣鼓的基本表现形式。与其它民间音乐相比,薅草锣鼓类传统农作音乐既与个体劳动者自由吟唱的“山歌”不同,亦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子”有别,薅草锣鼓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集体劳动的场合演唱。换言之,始初的薅草锣鼓不是孤立存在的艺术形式,必须与集体劳作相结合方能演奏歌唱。此后,流行薅草锣鼓地区的地方志等文献大多有相关记载。元《王祯农书》引曾氏《薅鼓序》云:“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烈清壮,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朝暮曾不绝响。悲夫!田家作苦,绮襦纨绔不知稼穡之艰难,因作薅鼓歌以告之。”^②此处的薅鼓之名、召集薅田人手、协作劳动、整齐劳动进度及音乐特征等,均为薅草锣鼓的主要构成因素。

在川楚陕交边地区,明清以降有关此类传统的基本记述,若追根溯源,大多数与宋人王禹偁的《畚田词》有直接或间接联系,其影响甚至超出长江流域。为全面理解其意,不妨引录全文如下。先看其序文:

上雒郡南六百里,属邑有丰阳、上津,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然后酿黍稷、烹鸡豚,先约曰某家某日有事于畚田,虽数百里如期而至,锄斧随焉。至则行酒啖炙,鼓噪而作,盖斫而掩其土也。掩毕则生,不复耘矣。援桴者有勉励督课之语,若歌曲然。且其俗更互力田,人人自勉。仆爱其有义,作《畚田词》五首,以侑其气,亦欲采诗官闻之,传于执政者。苟择良二千石暨贤百里,使化天下之民如斯民之义,庶乎污莱尽辟矣。其词俚,欲山氓之易晓也。

再看其《畚田词》:

大家齐力斫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各愿种成千百索^③,豆萁禾穗满青山。

杀尽鸡豚唤斫畚,由来递互作生涯。莫言火种无多利,树种明年似乱麻。^④

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刀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畚田鼓笛乐熙熙,空有歌声未有词。从此商於为故事,满山皆唱舍人诗。^⑤

王禹偁此词流传甚广,亦有步韵唱和之作^⑥,在相关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需要首先指出的是,王禹偁《畚田词》及“序言”所及内容甚为丰富,并非如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所言,仅针对“酿黍稷、烹鸡豚,先约曰某家某日有事于畚田,虽数百里,如期而至,锄斧随焉”的劳动形式而言,更不能仅仅视作山民劳作时所喊的号子,即所谓“打锣鼓”或薅草锣鼓、薅秧鼓之书面文言代称,其间蕴涵的丰富内容,包括畚田的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等,对于正确理解薅草锣鼓类农作音乐的形式和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王氏所作,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耕作方式。《畚田词》之“畚田”,首先即指“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掩毕则生,不复耘矣”的农业耕作方式——刀耕火种,包括了垦、耕、播种诸环节的技术手段,词中亦有“莫言火种无多利”、“相助刀耕岂有偏”等非常明确的文字表达。粗放耕作、广种薄收之特征跃然纸上。而“斫上高山入乱云”等语,则传递出山地垦殖已经达到很高程度的信息。

其二,“更互力田”、通力合作的农耕生产关系。所谓“杀尽鸡豚唤斫畚,由来递互作生涯”,说明此种

①或作“耘田击腰鼓以适倦”。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四,《四部丛刊》本;秦嘉谟:《月令粹编》卷二二,嘉庆十七年刻本。

②王祯撰、缪启愉:《东鲁王氏农书译注》,载《农器图谱集之四·薅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30页。缪先生考证,《薅鼓序》可能出自南宋曾之谨的《农器谱》,时间约在宁宗时期。又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八《经籍考四五》记载,曾之谨的《农器谱》成书于绍圣初元后约百余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73页)。

③夹注云:“山田不知畝亩,但以百尺绳量之,曰某家今年种得若干索。”

④夹注云:“种谷之明年自然生禾,山民获济。”

⑤王禹偁:《小畜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见《四部丛刊》本)。

⑥乾隆五十二年任山阳知县的福建晋江人林聪,有感于“王词所载旧俗”,“于郊行往往遇之”,特作《和王元之畚田词步韵》:郊行处处豁襟颜,口唱畚歌手不闲。叫了大工还合作,辛勤多半在秋山(有注云:俗谓叫大工亦曰换工,皆种秋禾事,锄麦则否)。鸣钲挝鼓促耕畚,锄遍峰头与水涯。鹄岭西东蚕事起,深山无地不桑麻。两行塘匠(方言称工人为塘匠)各微醺,齐唱田歌声遏云。牟麦丰收包谷好,西成更欲慰神君。荆豫纷纷竟课山(课山:方言,即租山),耕垌一视兑无偏。休因畦畦争牙角,此地由来少税田。小畜当年记皞熙,舍人集内有清词。只因山上荷锄者,可唱阍中令尹诗(载嘉庆《山阳县志》卷一〇《风俗志·农功》,嘉庆十三年刻本)。

互助的基本形态由来已久。而且只要先期约好斲畲日期,无论远近,即使远至数百里,皆能如期而至,且自带农具,更能“人人自勉”,“罢敝不休”,尽力劳作。“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刀耕岂有偏”之语,则表明这种“更互力田”的生产关系在参与者之间是相互的、普遍而无偏的,具有互相帮助的性质。正因为如此,王禹偁才会“爱其有义”。

其三,通过畲田鼓笛、歌唱来督课、激励劳动的田间劳作形式。所谓“鼓声猎猎酒醺醺”、“援桴者有勉勵督课之语,若歌曲然”,正是鼓手唱歌督工的场面,桴即鼓槌。这样的田间劳作形式是以“更互力田”、通力合作的集体农耕劳作方式为基础的,一般情况下,个人或一家一户的田间劳作并不适合亦不可能产生鼓歌督课这种形式。

不难看出,王禹偁之作《畲田词》,所重视的首要因素是“人人自勉”的“更互力田”之俗,即畲田耕作过程中彰显出来的“义”,其次才是鼓歌促耕畲田的形式。有鉴于此,则有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刀耕火种性质的畲田耕作方式是否长期延续?粗放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是否“更互力田”、通力合作的农耕生产关系产生、存在的基础,换句话说,耕作方式的进步或变化是否导致“更互力田”、通力合作的农耕劳作形式退出历史舞台?个体小农经济制度下的集体劳动机制是什么?

刀耕火种在中国有悠久历史,特别是在长江中游地区颇为普遍,有关记载亦多。史称“荆楚多畲田,先纵火燠炉,俟经雨下种。历三岁土脉竭,复燠旁山。燠,燠火燎草;炉,火烧山界也”。“楚俗烧榛种田曰畲,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斲畲,其刀以木为柄,刃向曲,谓之畲刀。”^①毫无疑问,粗放型农耕发展的方向是精耕细作,但对刀耕火种在山区的长期存在亦应有充分估计,不能为强调传统农业整体发展水平而有意压缩其延续的时间和空间。南宋范成大《劳畲耕》诗记述三峡地区农作状况云:“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斲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斲烧始可耘。”^②直到明清时期,不少山区仍然是这样的状况:“其民居无常所,田无常业。今岁于此山开垦,即携妻子诛茅以居,燔翳下种,谓之刀耕火种,力省而有获。然其土硗瘠,不可再种,来岁又移于他山,率以为常。”^③“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巨石,就地斧锯并施,树即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植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④时隔数百年,刀耕火种之法与王禹偁所述丰阳、上津等山区状况并无二致。

以往的研究肯定传统农业时代早期存在“更互力田”、通力合作的农耕生产关系,而且相信,随着粗放的刀耕火种型农耕方式被精耕细作所取代,土地私有及贫富分化加剧,这种“古代遗风”就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来自多方面的记载表明,实际并非如此。当然,具体的组织运作方式却难以一刀切之。

苏轼《眉州远景楼记》是较早具体、系统记载薅草锣鼓类农作方式的文献,所记乃其家乡之事。苏轼记云:

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以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酒,醉饱而去,岁以为常。^⑤

在数十百人曹的集体劳作,击鼓以齐进退等薅草锣鼓的基本信息之外,不能忽视的是其它文献极少涉及的有关责任偿、罚的内容。

“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是说这种劳作方式是有约定的,并非完全自由自主的活动。而“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则说明虽然是集体劳作,却非吃大锅饭性质的无偿劳动,而是有考核、有报偿的。考核的标准是受益的田地面积和投入的劳动力数量,二者相较,受益田地面积超过投入劳动力的部分,应该付出相应的费用;反之,则会获得相应的报偿。不过,所得罚金与报

① 庾信:《归田》,载《庾开府集笺注》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杜甫:《秋日□府咏怀》,载《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三〇,《古逸丛书》本。

② 范成大:《劳畲耕并序》,载《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〇,洪武八年五月己巳。

④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一,道光刊本。

⑤ 吕祖谦:《皇朝文鉴》卷八二,《四部丛刊》本。

偿似乎并不发给个人,而是“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酒,醉饱而去”,就此而论,又与纯粹的有偿劳动有别。换言之,这种集体劳作还是如王禹偁所说是“有义”的,不然,苏轼也不会将其列为自己家乡三种近古习俗之一。还有,由“岁以为常”之语可知,这种集体互助的劳作方式并非个别年份的特殊情况。

诸多地方文献记载表明,即使稻作农事,同样存在“更互力田”、通力合作的农业生产关系和鼓歌督课、鼓励劳动的田间劳作形式。在鄂西北地区,万历《鄖阳府志》引郡旧志云:“男妇插秧,击鼓而歌。”又分别引竹山县旧志和竹溪县旧志云:“栽种则击鼓讴歌”,“烧畚而田,栽种击鼓讴歌”^①。川东北巴州:“春日栽秧,选歌郎二人击鼓鸣钲于垄上,曼声而歌,更唱迭和,(细细)可听,使耕者忘其疲,以齐功力。有古秧歌之遗,夏芸亦如之。”^②同治《长阳县志》载:“(四月)其种稻,先一日主骑秧马入田取秧,扎成大把,名秧把,将秧把散掷净田中,均匀分立,名梅花瓣。栽秧者下田,各取秧把分插。皆佝偻以退为进,另二人击鼓锣唱秧歌,亦退而走。鼓缓插亦缓,鼓急插亦急,名点蓢。横直成行为上蓢。替换为接蓢。一人太快上前,众人俱落后,为勒蓢。鼓锣繁促不唱,插者亦繁促不语,为催蓢。插毕,彼此互要饮食,为洗泥,又曰洗犁。谓来岁方用犁,今后只须去草待收获也。”^③薅草之外,稻作的插秧环节亦流行薅草锣鼓劳动形式。即使狭义的“薅草”,亦非专指旱地,稻作亦须薅草。

在陕南地区,乾隆《洵阳县志·风俗》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证此俗确实在民间延续。该志云:

小畜所言,上洛郡属丰阳之俗耳。丰阳,今为商州之山阳县,其蛮川关与洵东接壤,风俗大抵

相同。今乡俗,薅草时一人鸣鼓督工,或以钲配之,歌唱忘疲,又通力合作,谓之换工,正其遗也。

以击鼓鸣钲来督工,以歌唱来提振精神,通过换工实现通力合作,正与王禹偁所记农作习俗一脉相承。然而,千万不可忽视的是,此时此地的农业耕作方式早已不是斫斫畚田时刀耕火种的状态了。

其它州县的记载如山阳县:“锄禾之功亦视麦为更劳,勤者三四次,最少亦需二次。往往邻里通力合作,少三二十人,多四五十人。前一二人鸣鼓督工,或佐以钲歌□□□名曰叫大工,亦曰换工。王元之《小畜集》所□丰阳旧俗,至今犹存,盖不于夏牟而于秋禾也。”^④再如褒城县,“农时集工治田,欢饮竟日,腰鼓相闻”^⑤。川东北地区的情形与陕南基本类似,民国《宣汉县志·礼俗》载:“土民自古有‘薅草锣鼓’之习。夏日耘草,数家趋一家,彼此轮转,以次周而耘之。往往集数十人,其中二人击鼓鸣钲,迭应相和,耘者劳而忘疲,其功较倍。”如果不这样做,工效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粮食收成。

陕南镇安县、紫阳县、川东北云阳县等地方志的记载表明,此类农作习俗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光绪《紫阳县志》、民国《紫阳县志》都摘录有王禹偁《畚田词》的有关内容,并且分别加了按语。其按语分别云:“所言上洛、丰阳之俗耳,今为山阳县,其蛮川关即洵东接壤,风俗今犹相似,而紫邑亦然。”“此俗今犹沿袭,名曰打锣鼓。”^⑥民国《镇安县志》则云:“农用忙时,班工不敷用,召集里党人相助,或数十,或数百,如期而至,饷以酒肉,群至陇亩,援桴者二人,唱俚歌以助其兴,不给工值,名曰撻锣鼓。”^⑦不难看出,《紫阳县志》和民国《镇安县志》所述,绝非简单地承袭旧志文字,应有当时实情的依据。民国《云阳县志》所载更为具体,引述如下:

农者相约,计日先后,相助插秧,邻村合作……饷午极丰,人颁腌鸡子二,新藕大齏,团坐田畔享之,主人不惜费也。

耘(耒予)之役,亦比邻相助。勤者三耘,次二之。多唱田歌以趣省便且俾悦而忘倦也。歌者二人,一鼓一钲,植立众前,初操曼声为迎神之曲,间以短歌促节,涉及猥狎,以资欢笑。日晡则为送神谢主之词,男妇杂沓。闻某氏薅草,有歌鼓则群趋之,荷锄成队,常数十人。隔溪越岭,不远而至。淹旬之务,终日而毕。一以集众,一以促功,故相沿不废矣。^⑧

① 万历《鄖阳府志》卷一四《风俗》,万历六年刻本。

② 道光《巴州志》卷一《地理志·风俗》,道光十三年刻本。

③ 同治《长阳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同治五年刻本。

④ 嘉庆《山阳县志》卷一〇《风土志》,嘉庆十三年刻本。

⑤ 卢坤:《秦疆治略》,道光刊本。

⑥ 民国《紫阳县志》卷五《纪事志·习俗》,民国十四年石印本。

⑦ 民国《镇安县志》卷九《风俗》,民国十五年石印本。

⑧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原注云:“田歌惟薅苞谷草最多,薅秧则间有之。”

所谓的“唱田歌”实即薅草锣鼓，其形式、乐器、程序、内容等，皆十分明确。而所述“闻某氏薅草，有歌鼓则群趋之，荷锄成队，常数十人。隔溪越岭，不远而至。淹旬之务，终日而毕”及“饷午极丰，人颁腌鸡子二，新菡大禽，团坐田畔享之，主人不惜费也”，则与王禹偁《畚田词》所记大致相同。

鄂西北、陕南、川东北之外，流行薅草锣鼓的湘鄂渝黔交边地区皆有相关记载。重庆黔江县：“（四月）是月插秧，比长五六寸，相约薅草，鸣钲鼓，更唱迭和以趣工，曰打锣鼓。”^①又如相邻的龙山县：“夏月芸苗，数家人合趋一家，彼此轮转，以次而周。芸时往往数十为曹，中以二人击鼓鸣钲，迭相歌唱，其余芸者，进退作息，皆视二人为节，闻歌欢跃，劳而忘疲，其功较倍。”^②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大多通过诸多农户之间互助的方式解决农忙时节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互助薅草时，必然演奏“薅草锣鼓歌”。同治《来凤县志》记载：“四五月耘草，数家共趋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毕，复趋一家。一人击鼓，以作气力；一人鸣钲，以节劳逸。随耘而歌，自叶音节，谓之薅草鼓。”^③长阳的情况是：“旱田草盛，工忙互相助，为换工，亦击鼓锣歌唱节劳逸。有头歇、二歇、三歇，至末，鼓锣与薅锄齐急，不闻人声，为赶薅，谓之薅二道草、三道草。”^④薅草锣鼓的流行与通力合作的劳作方式高度一致。

以上的论述，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薅草锣鼓类传统农作音乐，尤其有助于准确把握其鼓歌督工形式中积淀、蕴含的农业时代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高度关注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薅草锣鼓与精耕细作并行不悖。如前所述，薅草锣鼓之形式可能始自刀耕火种时代，但是，传统农耕由粗放的刀耕火种向精耕细作的转变，并没有淘汰或排除“更互力田”、通力合作的农耕生产关系，它与鼓歌督课、激励劳动的田间劳作形式一起持续存在。宋代以后，薅草锣鼓类音乐更多地是与薅秧、插秧、薅草中耕等具有精耕细作性质的农作环节相结合，通过其集众、激发劳动兴趣、促功、消除疲劳、提高劳动效率等功能，有力地推进了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形成。

锣鼓类传统农作音乐以“薅草”、“薅秧”等并非刀耕火种性质的农作环节为名流行后世，本身就颇能说明问题。同时也证明了薅草锣鼓的延续，并不等于粗放的耕作方式必然存在。

其次，薅草锣鼓不单纯是一种音乐形式，而是农耕劳作——耕种、薅秧、插秧、薅草等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薅草锣鼓，对相应的农耕活动的完成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或无法进行。传统农作音乐形式的薅草锣鼓不能孤立存在，独立演唱的薅草锣鼓歌算不上真正的薅草锣鼓，演唱必须与相应的集体劳作结合在一起，方能叫做薅草锣鼓。这样的田间劳作形式是以“更互力田”、通力合作的农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一般情况下，一家一户的田间劳作不需要、亦不可能产生鼓歌督课这种形式。因此，研究、传承薅草锣鼓，不可忘记、亦无法脱离集体劳作这一前提。

再次，个体经济制度下的集体劳动机制。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个体小农经济体制，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分散进行生产，这是中国农村世代相沿的经营模式。但薅草锣鼓等传统农作音乐所展现出来的却是有规模的集体劳动场面，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引人注目。论者或从单家独户面对初夏杂草的疯长无能为力，山区及丘陵的立体型气候导致的山脚、半山和山上杂草生长速度不一致、盛夏薅草劳动强度大等方面论述农民组织起来分期除草及薅草锣鼓流行的原因，显然这些只能部分地说明问题。

最后，在分散的小农经济体制下，集体劳动的达成势必具有不同程度的互助合作性质。那么，如何达成、维持互助合作，实乃问题的关键。前述各地与薅草锣鼓结合的田间集体劳作形式，绝大多数是通过换工途径实现的。从较早的“由来递互作生涯”“相助刀耕岂有偏”到后来明言“通力合作，谓之换工”、“工忙互相助，为换工”，或云“更互力田”，或云“数家趋一家，彼此轮转，以次周而耘之”，或云“彼此轮转，以次而周”，或云“一家耘毕，复趋一家”，都未脱离换工性质。正如清代长阳诗人彭秋潭在《长阳竹枝词》中所描述：“换工男女上山坡，处处歌声应鼓锣。”

其间亦有无需换工，纯粹属于扶助贫困性质的集体劳动。对此，个别地方志的记载提供了一些线索。

① 光绪《黔江县志》卷五《风俗志·月令》，光绪二十年刻本。

② 同治《龙山县志》卷一一《风俗·农事》，同治八年刻本。

③ 同治《来凤县志》卷二八《风俗志·农事》，同治五年刻本。

④ 同治《长阳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同治五年刻本。

乡农有贫不能东作者,比邻约期助工,尽一日力,不受值,农家祇备酒饭相款。以二人鸣金鼓,唱山歌娱之,工作益奋,日打薅草锣鼓。颇有助恤之风,洵美俗也。^①

这里所说的“薅草锣鼓”,显然为纯粹的扶贫助工性质,既不用换工,亦不会有报酬,故有“美俗”之称。陕南也存在同样的美俗,美其名曰“打锣鼓”或“做神福”。据称:“某家因病或因其他困难而人手短缺,有误农事时,便有热心人为其张罗‘打锣鼓’。”^②因此有远近亲邻前来帮工。打锣鼓时所唱歌词有“百索山地,千种风光;一籽下地,万石归仓”等语,从中亦不难看到王禹偁《畚田词》的痕迹。

这种堪称美俗的互助之风,显然与中国古代社会分化的趋势不无抵牾。众所周知,共济助恤为历代统治者所极力倡导之社会风气,但贫富关系的协调却呈愈加困难之势。宋元明清时期,对于通力合作也有二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倡导互助、通力合作,强调贫富之间亦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一种是不赞成互助,认为通力合作行不通。前者如宋李昭玘:“男子不足于耕也,相从而助耕;妇人不足于绩也,相从而助绩;一乡之事皆通也,无求而不得。”^③明初朱元璋曾谕户部:“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宁有不亲睦者乎!”^④晚明诸葛升为倡导“当耕种收获之时,缓急相周,各相帮助,如古通力合作之意”^⑤,不惜提出荒业者同井之人同罪的连坐之法。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帝皆重视民间相互救助,极力倡导贫富相维,闾里相济,田主赈济佃户等互助观念,视此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宝之一。嘉庆皇帝更有“贫富有丰啬相济之情,业佃尤有缓急相通之谊”之说^⑥。名家包括朱熹、真德秀、丘濬等均有相关论述。

不赞成者如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他认为:“人之有强羸之不齐,勤惰之不等,愿诈之不一,天定之矣”,即使圣人也不能使之划一整齐,因此,要想众人达到通力合作乃至均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今使通力合作,则惰者得以因人而成事;计亩均收,则奸者得以欺冒而多取;究不至于彼此相推、田卒污莱、虞诈相仍、斗讼蜂起而不止……使耕尽人力而收必计口,则彼为此耕而此受彼养,恐一父之子不能得此,而况悠悠之邻里乎!……则合作均收,事所必无,理所必不可,亦不待辨而自明矣!”^⑦又云:“若羸惰之民,有田而不能自业,以归于力有余者,则斯人之自取,虽圣人亦无如之何也。”^⑧所以,他并不承认存在真正的通力合作,更不赞成强制性地富人财产均给穷人。清代学者陆世仪提供了如下例证:“蒔秧之法,每人蒔一行,每行横蒔六棵,每棵相去八寸,此定法也。今田家或互相换工,或唤人代蒔、包蒔,奸人偷力,多将秧棵蒔开,每棵相去或至一尺外及尺许不等者,则一亩地几减秧棵大半,收获鲜少,半由于此,不可不知。”换工或代蒔、包蒔产生的偷工省力之弊,正与王夫之之说一致。不过,陆世仪同时记录了东家采取的对策:“蒔秧之日,酒饭极丰,其蒔法:每人俱以□约,使不过五寸,故其田秧棵密而分行整,收获亦倍。”^⑨表明还是有办法解决换工中的弊端,而不至于因此废除通力合作的方式。

尽管存在争议乃至截然对立观点,但无论如何,在个体小农经济条件下何以实行且得以实现较大规模集体性质的农耕劳作,仍然是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至于通过换工甚或没有换工进行的具有助恤性质的“更互力田”、通力合作的田间劳作形式在多大范围内得以实行、又能够占到多大比例,其与租佃制度、雇佣劳动形式之间的关系等,亦应进一步深入考察。

三、余 论

不得不指出的是,有的地方论及本地的传统农作音乐,常有对其所及时空、性质不甚了然甚或误解的现象,问题的产生,不同程度上与其对所及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内涵了解不够,尤其理解肤浅相关。

①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风俗》,光绪九年刻本。

② 《商洛乡土习俗》,http://www.shangluo.gov.cn/index.htm,2007-06-06。

③ 李昭玘:《乐静集》卷二六《属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六,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参见《明史》卷三《本纪第三·太祖三》。以前学界有论及朱元璋此谕旨者,多以为无实际意义的空谈。若从“薅草锣鼓”在广大区域内普遍存在立论,其主张似又非毫无实据。

⑤ 诸葛升:《垦田十议》,载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八《农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6页。

⑥ 杨景仁:《筹济编》卷一〇《劝输》,光绪刻本。

⑦ 王夫之:《四书稗疏》卷一,光绪十三年潞河啖柘山房刻本。

⑧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26页。

⑨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一一《修齐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误解一，在薅草锣鼓的起源上，不少文章一方面说薅草锣鼓历史悠久，同时却在具体的论证中将薅草锣鼓的起源和玉米（苞谷）地的除草劳动联系起来，甚或直言“青川薅草锣鼓发源于薅玉米草的田间劳动，是一种起源于民间的农事歌舞。”更有甚者，直接把薅草锣鼓当作 1949 年以后集体化时期的产物。薅草锣鼓历史悠久毫无疑问，但玉米在中国大面积种植推广却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薅草锣鼓固然在玉米地薅草时演唱最多，却不能因此说薅草锣鼓起源于薅玉米草的田间劳动。

误解二，基于薅草锣鼓得以存在的场合——群体劳作，以为薅草锣鼓是“大户人家”才能请得起的，因为小户人家是不会请、亦请不起数十甚至上百人为其薅草劳动的。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劳动力少且雇不起人的小户人家之间的“更互力田”、通力合作性田间劳动往往成为薅草锣鼓的用武之地。

类似的问题还表现在对薅草锣鼓衰落的认识上。不少地方谈到薅草锣鼓乃至田歌的衰落，都以为是土地承包到户的农村改革，致使群体劳动机会变少、薅草锣鼓无用武之地，因而急剧衰落。产生这种认识的基本参照是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时期，集体劳动场合多，薅草锣鼓盛行。而误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仍在于对薅草锣鼓之历史文化内涵缺乏理解，不知道历史上此类传统农作音乐流行的主要时段，恰是在个体小农经济体制时期，而这也正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正如薅草锣鼓这一音乐形式不能脱离薅草、插秧等农耕劳动，必须与相应的劳作过程结合起了理解才有意义一样，薅草锣鼓等民间农作音乐的保护传承，艺术形式亦不能脱离其文化内涵。如果文化遗产形式与文化内涵分离，文化遗产中蕴藏的历史、风俗、信仰、精神，反而有可能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义下丧失。“时过境迁”往往成为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共同遭遇的困惑，发掘、发扬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内涵，应是减少“时”“境”局限的有效途径。

Searching for the Rhythm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ra by the Weeding Gongs and Drums

——Focus on the Edge Region of *Chuan*, *Chu* & *Shan* (川楚陕)

Zhang Jianmi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of the traditional farming music, the weeding gongs and drums not only have the professional value of the music, art, language and so on, but also hav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active working atmosphere, improve labor efficiency, pray for good weather and so on. The weeding gongs and drums accumulated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the form of simple straightforward, as well as contained the deep and important spirit of the time. It should b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spirit of the coopera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It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through the way such as help each other and exchange labor, whether in the mountains or beyond the extensive slash-and-burn farming methods. The weeding gongs and drums do not exist in isolation art form at the beginning. What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is that the weeding gongs and drums must be combined with collective work mutual ai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farming technology, agriculture etc.

Key words: weeding gongs and drums; cooperative farming; farming system; farming culture

- 作者地址：张建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qxzhang@whu.edu.cn。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38)
- 责任编辑：桂 莉

